

# 中文典籍外译的本质与意义

## ——基于三部启蒙经典翻译的考察与思考

###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Based 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ultilingual Versions of Three Primers

刘树森  
LIU Shusen

#### 摘要:

自16世纪末叶欧洲耶稣会士将《三字经》等经典翻译为拉丁文，中文典籍便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为多种外语，中国思想文化也因此得以持续与世界各种语言文字的读者进行交流与互动，促进了人类文明不断融合与发展。本文拟在世界翻译历史的视阈中，考察《千字文》《三字经》与《弟子规》等三部中文启蒙经典翻译的历史，尤其是讨论其英语翻译的历史，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解读翻译策略与文本特征，藉此探讨中文典籍翻译的本质与意义。

#### 关键词:

中文典籍；翻译；启蒙经典；描述；策略

#### Abstract:

Since European Jesuits first translated *The Three-Character Primer* and other canons into Latin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of the 16th century, Chinese classics have been continually translated into numerou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refore Chinese thoughts and culture could keep engaging with readers of other languages worldwide for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 contributive to promote the mutual 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s.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make a contextual study of the four-century history of translating *The Thousand-Character Writing*, *The Three-Character Primer*, and *Canons for Disciples* from Chinese into other languages,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their English versions, as it is contextualized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ly interpret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extual features, as a way of further discussing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foreign languages.

#### Kew words: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primer; description; strategy

## 1. 引言

中文典籍翻译始于 16 世纪末叶, 迄今已有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历史, 中国思想文化也因此得以持续不断地与世界各国其他语言文字的读者进行交流与互动, 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融合与发展。回溯中文典籍翻译四百余年的历史, 不难发现其翻译本质与意义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伴随朝代岁月的更迭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变化, 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其中主要包括: 译者的国籍与社会身份不同, 翻译理念有别, 翻译目的与策略迥异, 译作的预期读者差别显著, 因此翻译文本的影响范围及其结果自然也不尽相同。

长期以来,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文典籍翻译的相关研究一直较为薄弱, 现有研究成果往往以个案研究为主, 描述与探讨某些典籍翻译的突出特征或者个别译者的翻译活动及其成就, 从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视角讨论其翻译特征, 以及译作的传播与影响等, 但始终缺乏较为宏观和系统性的历时研究, 包括疏于对中文典籍翻译的本质与意义的历史考察与研究。值得关注的是, 最近已有研究尝试弥补以往研究的上述薄弱环节, 例如从翻译策略与历时研究的视角探讨 19 世纪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三字经》多个译本的特征及其价值。(刘岚 2016: 138-143) 本文拟在世界翻译历史的视阈中, 考察四个多世纪以来《千字文》《三字经》与《弟子规》等三部中文启蒙经典翻译的历史, 尤其是讨论其英语翻译的历史, 从中国与西方的翻译历史以及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着眼, 分析上述典籍翻译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发生的过程以及较为宏观的翻译特征, 藉此探讨中文典籍翻译的本质与意义。

## 2. 《三字经》与《千字文》早期翻译历史

在卷帙浩瀚的中文典籍宝库中, 启蒙典籍历史悠久, 数量众多, 文本简练, 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 易于背诵, 读者范围广泛, 历来具有重要的基础与核心地位。最早的启蒙典籍可追溯至周朝(公元前 1056—公元前 256)问世的《史籀篇》, 相传作者为周宣王(?—公元前 783)当政时的史官史籀(生卒年份不详), 以及秦朝大臣、政治家与文学家李斯(公元前 284—公元前 208)等人撰写的《仓颉篇》。在历代启蒙典籍中, 尤其以《千字文》《三字经》与《弟子规》流传最为广泛, 影响最大, 因此也早于其他启蒙典籍传播至其他国家, 或较早被翻译为其他语言文字。

《千字文》由南朝大臣、史学家周兴嗣(469—537)所著, 全文 1000 字, 每句由四个字构成, 对仗工整, 内容包罗万象, 犹如一部百科全书, 从开天辟地与日月天地等自然现象到修身立命之本及人伦常情, 气势恢宏, 文笔优雅。通常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官员、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王应麟(1223—1296)。《三

字经》的传统版本共计 1145 字，每句由三个字构成，文字抑扬顿挫，而且内容丰富，将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念、人情世故与家喻户晓的典故交织在一起，通俗易懂，生动感人。相比之下，《弟子规》成书的时间较晚，清初由学者和教育家李毓秀（1647—1729）编撰而成，全文 1080 字，每句由三个字构成，概括与弘扬了孝悌、谨信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有关衣食住行及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以凝练的诗体表述，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也很快成为广为流传的启蒙读物。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也使得《千字文》《三字经》与《弟子规》备受关注，再次成为广为流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读本。

《千字文》《三字经》与《弟子规》的上述特征，构成其较早传播到其他国家以及被翻译为其他语言文字的核心因素。由于地缘与文化起源及其传统的密切相关性等因素，《千字文》和《三字经》在日本、朝鲜、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传播由来已久，几乎与原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一样长久，影响深远，而且早期传播并没有借助于翻译。据考证，《千字文》在日本的传播始于隋唐时期（581—907），源远流长。（符力 1989：80-83）至少在始于 17 世纪初叶的江户时代（1603—1868），《三字经》便已传入日本，迄今日本仍保存这一时期刊印该著的八个版本。（鹤道俊一郎等 2004：123）据记载，《三字经》在朝鲜的传播始于 16 世纪初叶，目前韩国现存该著的版本可证实，至少 17 世纪初叶《三字经》已在朝鲜广为流传。（钱茂伟 2009：165）《千字文》传播至朝鲜的确切年代尚无法考证，但应当早于 10 世纪，并出现了不同的刊印版本；晚近有研究考证，《千字文》早期在日本与朝鲜出现的中文版本，包括其中日语与朝鲜语的注释与注音等副文本的内容，对 19 世纪初叶欧洲来华传教士与汉学家将该著翻译为英语和德语等欧洲语言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陈辉 2006：147-150）这一研究成果也可以显示：在汉文化圈特定的语境之中，《千字文》语内传播与语际传播之间的相关性，对探讨中文启蒙典籍翻译的特征与文化交流的本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三字经》自 16 世纪晚期开始被翻译为欧洲语言；这部启蒙典籍的翻译与欧洲传教士来华布道以及此后西方汉学的兴起密切相关。作为近代最早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之一，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1579 年抵达澳门，依照耶稣会的指令开始学习汉语，作为在华生存、交流与布道的基础。罗明坚研习汉语两年之后，1581 年率先将其青睐的启蒙读本《三字经》翻译为拉丁文。（郑志明 2011：41-43）罗明坚的《三字经》拉丁文译作完成之后，没有刊行，而是将译稿直接寄至位于意大利的耶稣会总会，成为历史上记载的最早被翻译为西文的中文典籍之一。罗明坚翻译《三字经》的目的，是将其用

作耶稣会士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的启蒙教材；此外，与《四书》等耶稣会士随后翻译的其他中文典籍相比，显而易见，翻译《三字经》的难度较低。（耿相新 2014: 301-302）

古今中外，典籍翻译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取决于典籍自身的特征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需求。罗明坚翻译《三字经》的目的，与古罗马诗人、剧作家和翻译家里维乌斯（Livius Andronicus, 公元前 284—公元前 204）公元前 250 年将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翻译为拉丁文的动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里维乌斯的初衷，是将这两部具有崇高地位和声誉的史诗的译作作为最早的拉丁文教科书，填补古罗马缺少拉丁文教材的空白。作为历史上第一首拉丁语诗歌与第一部被翻译为拉丁语的文学作品，里维乌斯所翻译的荷马史诗影响长远，在问世 200 余年之后，西塞罗和贺拉斯等古罗马最杰出的诗人仍旧将其作为经典著作阅读。显然，罗明坚选择翻译《三字经》的目的，恰好与这一启蒙典籍自身的教育本质相吻合。

罗明坚采用拉丁文翻译《三字经》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拉丁文仍旧是当时来华耶稣会士使用的书面工作语言。然而在当时的欧洲社会，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之后，拉丁文正在逐渐失去其在中世纪欧洲宗教与世俗社会中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各国纷纷使用各自的民族语言翻译《圣经》，包括 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德文全译本。在当时的背景下，罗明坚《三字经》的拉丁文译本虽然没有刊行，读者的数量也极为有限，但它的影响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对后世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等其他欧洲语言译本的问世都直接或者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罗明坚之后，另有《三字经》的三个拉丁文译本问世。其一，1864 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nignan Julien, 1797—1873）将《三字经》翻译为拉丁文（*Trium Literarum Liber*），译本在巴黎出版，采用汉语与拉丁文对照，用罗马拼音为每个汉字注音，并附有《康熙字典》214 部首表。其二，留学意大利的中国学生郭栋臣（1846—1923）1869 年将《三字经》翻译为拉丁文（*San-Tche-Kim: Doctrina Trisillaba*），采用中文源语文本和拉丁文译文对照的方式，每页上半部分为中文，竖排版，下部分为拉丁文译文。译作在意大利出版，封面内容全部为中文。（郭栋臣 1869）郭栋臣因此成为历史上将《三字经》翻译为西文的第一位中国译者，与辜鸿铭 19 世纪末叶将《论语》《中庸》与《大学》等中文典籍翻译为英文相比，大约要早 20 年。其三，来华意大利教育家、汉学家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1878 年编译出版的拉丁文教材《中国文学教程》（*Cursus Literaturar Sinicae*），在第二册中收入其翻译的《三字经》拉丁文译本。（赵凤玲 2015: 133）《中国文学教程》也收入了晁德莅翻译的《千字文》拉丁文译本，这也是《千字文》的第一个西方语言译本。晁德

莅翻译《千字文》的目的,是将译本作为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入门教程,与翻译《三字经》的宗旨一致。

18 世纪上半叶,《三字经》的第一个俄文译本问世,早于英文等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约一个世纪。18 世纪初,俄国东正教开始在北京设立布道团常设机构。为了辅导该机构的神职人员与学生学习汉语,后来被誉为俄国汉学奠基人的罗素欣(N. K. Poccoxnh, 1717—1761)在 1740 年前后将《三字经》与《千字文》翻译为俄文,译作用于汉语教学,但始终未能出版发行。(伍宇星 2007: 111)罗素欣的《三字经》译稿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1779 年,俄国汉学家列昂季耶夫(Alexei Leontyev, 1716—1786)翻译的俄文版《三字经》,被收入《三字经明贤集合刊本》在俄国出版,成为最早出版的《三字经》俄文译本。(伍宇星 2007: 110-112)罗素欣与列昂季耶夫的译本都采用了散文体,类似于罗明坚、郭栋臣与晁德莅拉丁文译本的语体风格。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伴随着拉丁语的衰落,法语、德语与英语等欧洲各国的民族语言得以迅速发展。因此,从 19 世纪初开始,作为来华传教士传统书面工作语言的拉丁语也逐渐被取而代之。与此相关,中文启蒙典籍翻译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主要包括翻译语言的变化与语种的增加,以及各种语言的重译本快速增加。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远渡重洋,1807 年抵达澳门,一边刻苦学习汉语,一边努力将《圣经》翻译为中文,编纂《华英字典》,以及布道。其间,他将《三字经》首次翻译为英文,译作被收入 1812 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春秋》(*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这部译作具有阐释性内容的标题: *San Tsi King: 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 on the utility and honour of learning*, 包括“三字经”三个字的罗马拼音、英文意译以及译者增添的副标题“论学习的功用与荣誉”,不仅显示了译者对该著的理解,也能够折射出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阐释性翻译方法,有别于其《圣经》中文译本字斟句酌的特征。1831 年,英国传教士修德(Samuel Kidd, 1804—1843)将《千字文》首次翻译为英文,译文采用英文散文体。

作为曾经拜师马礼逊研习汉语的门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1835 年也将《三字经》翻译为英文,发表在他创刊并担任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沿用了马礼逊所采用的阐释性与辅助阅读的翻译策略,译本标题也凸显了这一特征: *San 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work ill. & adapted to the purposes of primary education*。然而,裨治文这一译本的翻译质量

后来被一些汉学家所诟病。(Giles 1900: IV) 1835年, 裨治文还采用散文体将《千字文》翻译为英文, 发表在英文刊物《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1年, 裨治文发表了其《三字经》英文译本的修改版, 采用汉英对照的双语版本, 收入他编纂并在澳门刊行的中文教材《广州方言中文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这一译本还考证了历代中文《三字经》的不同版本及其历史演变, 对后来传教士翻译这部典籍时选择源语文本的版本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邹颖文 2009: 176-177)

19世纪上半叶, 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 当时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 《三字经》与《千字文》英译本的出现意味着其英语读者会远远高于此前拉丁文与俄文译本的读者数量。也不难想象, 英文译作随后产生的影响也会更为巨大和深远。这一时期, 《三字经》与《千字文》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也相继出现。俄国汉学家比丘林(N. Y. Bichurin, 1777—1853)翻译的《俄汉对照三字经》1829年出版。这一译本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采用了诗体译文, 而且还对一些典故等历史文化内容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注释与解说, 此外, 还采用了汉俄对照的方式, 方便初学汉语的俄文读者研习。德国东方学家纽曼(von Carl Friederich Neumann, 1793—1870) 1829年来中国研习汉语与中国文化, 同时搜集了一万多册珍贵的中文典籍与手稿, 带回德国。1836年, 纽曼翻译的《三字经》德文散文译本被收入《中国学堂》(*Lehrsaal des Mittelreiches*), 在慕尼黑出版。德国学者霍夫曼(Joseph Hoffman, 1805—1878)翻译的《千字文》德文译本1840年完成, 同年出版。

1856年, 英国神学家与东方学家马兰(Solomon Caesar Malan, 1812—1894)将《三字经》翻译为英文, 译本在伦敦出版发行, 译本名称为《三种三字经》(*The Three-fold, San-Tsze-King, or The Triliteral Classic of China*), 强调翻译过程中参照了该著的三种源语文本。1860年, 美国传教士曾金斯(Benjamin Jenkins)也将《三字经》(*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翻译为英文, 采用汉英对照, 并使用罗马拼音和上海方言两种拼音方式为正文中的汉字注音, 译作在上海出版。

1863年, 法国汉学家儒莲将《三字经》翻译为英文散文(*San-Tsze-King: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作为汉语入门教程, 以汉英对照的方式在巴黎出版。此后, 儒莲又将《三字经》与《千字文》翻译为法文, 1873年在日内瓦出版。1873年, 法国汉学家颇节(G. Pauthier, 1801—1873)也出版了其翻译的《三字经》(*Le Livre Classique des Trois Characters*)法文译本, 正文采用汉法双语对照, 并提供了丰富的译者注释。另外, 德国传教士艾特尔(Ernest John Eitel, 1838—1908)同样采用散文体将《三字经》翻译为英文, 正文中将译者自己添加的注释性内容用括号标注, 译

作被收入其英文著作《汉语教程》（*Chinese School Books*），1892年出版。

1873年，英国驻华外交官、中文翻译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翻译的《三字经》与《千字文》英译本，以《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为题出版；同年，他又出版了《三字经》与《千字文》英译本的合集（*The San Tzū Ching, or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nd The Ch'ien Tsū Wên or Thousand Character Essay*）。在翻译过程中，翟理斯参考了裨治文等前辈译者的译本，沿用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中文典籍的传统。

### The San Tzū Ching

Men, one and all, in infancy are virtuous at heart;<sup>1</sup>  
 Their moral tendencies the same, their practice wide apart.<sup>2</sup>  
 Without instruction's friendly aid our instincts grow less pure;  
 The application only can proficiency ensure.

【 1. This theory was a favorite doctrine with Mencius, in which he was vehemently opposed by Hsun-tzu, one of the five philosophers mentioned below, who wrote an essay to prove that the nature of man is evil.

2. These words are found in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XVIIth Book of the Analects*, [see line 58] and are thus translated by Dr. Legge: —“By nature men are nearly alike; by practice, they get to be wide apart. ” (Giles 1873: 1)

1873年，翟理斯年届28岁，来华6年，虽然才学与翻译资历尚浅，但恃才傲物，对已有《三字经》的西文译本并不满意，决定重译。然而翟理斯当时尚未具备出众的理解力与翻译能力，他的译作也延续了此前译本的一些普遍特征。例如，为了优先保证英文译文的可读性，翟理斯也采用了阐释性的英文韵体，以及引经据典的详细英文注释。在译文的语句结构方面，翟理斯大体上是将《三字经》中文源语文本中每两行的内容翻译为一行英文，例如“Men, one and all, in infancy are virtuous at heart”与“人之初 / 性本善”（王应麟 1986: 1）相对应，其余译文的语句结构可此类推。除此之外，英文译本几乎没有致力于使英文译文在语义、韵律节奏与叙事结构等方面与中文源语文本相对等，也没有提供中文原文。如果与翟理斯1900年出版的《三字经》英文重译本相对比，上述特征就会显得更为明显。

与上述《三字经》的英文译本相比，翟理斯翻译的《千字文》英文译本虽然仍旧是优先建构英文译文的可读性，但具有一些明显不同的特征，例如致力于使英文

译文的话语结构与中文源语文本相对应，减少阐释性的附加内容，英文注释的篇幅明显少于《三字经》的英文译本等。这些差异应当与翟理斯的翻译目的相关，即《千字文》英文译本的读者显然有别于《三字经》。

### The Ch'ien Tsū Wên

Dark skies above a yellow earth:  
 Chaos before Creation's birth!  
 The sun and moon their courses run;  
 The stars shine out when day is done.  
 Cold weather comes, the summer over;  
 In autumn reap; in winter store. (Giles 1873: 12)

对照《千字文》的中文源语文本（周兴嗣 1987：1），可以看到第一行英文译文“Dark skies above a yellow earth”与“天地玄黄”的内容与结构对应，第二行译文“Chaos before Creation's birth”也与“宇宙洪荒”在语句结构上相同。在第二行译文中，翟理斯按照《圣经·旧约》中上帝创造世界的信仰与理念，用“Creation's birth”翻译中国神话中洪荒时代的“宇宙”，试图将基督教的信仰与文化元素植入《千字文》的英文译本。清末民初，上述文化植入现象常常出现在西方来华传教士或者汉学家翻译中文典籍的译作文本中。

另外，翟理斯与英国外交官、汉学家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合作，1873年出版了汉德英三种语言的《三字经》合集，由阿连壁提供了附加注释。翟理斯的《三字经》英译本问世之后褒贬不一，加之他年轻气盛，对自己的译本也始终并不满意，希望能够予以重译。实际上，在翟理斯的心目中，1873年的《三字经》英文译本或多或少都带有挑战传统与翻译试验的双重因素，所以译本的封面印有英文谚语“愚者妄为之处，天使望而却步”（“Fools rush in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Giles 1873)，以诙谐的风格显示了他的翻译态度。

1893年，48岁的翟理斯因健康原因辞去在英国驻华使馆的职位，返回英国。1897年，他受聘担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并在这一职位任职长达35年，专事汉学研究教学，成就显著，其中包括实现了他期盼多年的重译《三字经》的计划。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翟理斯并没有同样关注《千字文》的英文译本，也始终没有重译这部启蒙经典。

作为近现代中文启蒙典籍翻译的典范，翟理斯的《三字经》重译本1900年问世，

同时在上海和伦敦发行，取名为《汉语初级读本：三字经》（*Elementary Chinese: San Tzū Chi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erbert A. Giles*）。20 世纪上半叶，翟理斯的《三字经》英文重译本多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中国、英国和美国出版。就其屡次再版的情况而言，在近现代的西方，这一译本应当是中文启蒙典籍最为流行的西文翻译版本。

在《三字经》1900 年的译本中，翟理斯运用了当时西方与中国典籍翻译方面几乎全部的重要技巧，包括采用当时流行的威妥玛拼音为每一个汉字注音，使用 1-4 的阿拉伯数字依次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等四声，在每个汉字的右上角标注音调，以便协助读者读音准确。另外，译本还按照权威的辞典《说文解字》对汉字的部首与偏旁等结构特征以及语义逐个进行分析与解说。译本的版式为中文源语文本与英文译作文本逐字对照，在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翻译每个汉字的语义，并为每一个汉字提供释义与相关阐释，包括中西文化对比与阐释，并按照《三字经》的语句结构逐句提供散文译文，最大限度为英文读者提供理解与学习的方便。

上述特征均没有出现在《三字经》1873 年的译本之中，显示翟理斯 1900 年已经发展成为杰出的汉学家与炉火纯青的中文典籍翻译家。在这一译本的封面，翟理斯注明自己的身份为“名誉法学博士、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宁波领事馆前领事”（Giles 1900），而 1873 年译本封面的署名是“领事馆官员”（Giles 1873）。因为内容丰富，1900 年译本的篇幅大为增加。1873 年的译本包括《三字经》与《千字文》的两个英文译本，全书篇幅为 28 页。1900 年的译本只包括《三字经》的英文重译本，篇幅却大幅增加到 178 页，足见其中的内容变化之大。下面的引文出于 1900 年译本开篇部分，包括“人之初 / 性本善”的英文译文、注音与英文阐释，体现了该译本内容结构的典型特征。

1. 人 之 初	
Jen <sup>2</sup> chih <sup>1</sup> chu <sup>1</sup>	}
Men arrive beginning	Men at their birth

**Jen** is the picture of the object—Shakespeare’s forked radish. Like all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a root idea, humanit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nd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var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ositions in a sentence and the exigencies of logic. The context, lines 3 and 4, here calls for a plural.

**Chih** originally meant to issue forth as grass from the ground; and by extension, to meet, to arrive at. It has come to be used conventionally as a sign of the possessive case, a particle of subtle influence, and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and also, from its shape, = zigzag.

**Chu** is composed of 刀 *tao* knife as radical, and 衣 *i* clothes (衤 in combination), and is said to derive its mean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knife or scissors to a piece of cloth.

2. 性 本 善  
Hsing<sup>4</sup> pên<sup>3</sup> shan<sup>4</sup> } are naturally good.  
Nature root good }

**Hsing** is composed of 心 *hsin* heart as radical (忄 in combination) and 生 *shêng* (line 297) as phonetic. It means the moral nature, disposition, temperament with which man is endowed at birth. Heart is used as being the seat of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faculties.

**Pên** is composed of 木 *mu* a tree (line 66) as radical, and a horizontal line to indicate locality. It is much used in the sense of the fundamental, original, native, etc. See line 68.

**Shan** was originally composed of 羊 *yang* sheep (line 77) and 言 *yan* words doubled. The latter portion has been corrupted and the character is now classed under radical 口 *kou* mouth (line 263).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sheep enters into several characters referring to excellence, duty, property, etc. See line 14. (Giles 1900: 2-3)

如上文的内容与格式所示, 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摈弃了 1873 年译本中单纯的英语韵体译文, 改为采用欧洲《圣经》逐字逐行翻译的早期传统, 译文的语句结构与内容顺序与中文源语文本相对应。如果与其 1873 年的译本相比, 1900 年译本最重要和最本质性的变化便是英文译文的内容、格式与风格焕然一新, 彰显了翟理斯汉学研究与中国典籍翻译的造诣。